

从跨文化阐释的角度对比《中国哲学简史》 与《生死疲劳》的翻译

曾辉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 福建 漳州 361105)

[摘要]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时期, 翻译如何助力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与莫言《生死疲劳》的翻译中, 存在许多共同的跨文化阐释的成功因素, 文章拟从跨文化阐释的角度对两部作品的翻译进行对比, 从中摸索并总结成功的跨文化阐释的构成因素, 从而为中国文学与文化英译的工作提供有效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翻译; 跨文化阐释; 中国文学与文化英译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7.03.023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7)03-076-03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 中国文化与文学日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 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中国政府推出的“熊猫丛书”, 翻译介绍了数百部中国文学作品, 然而绝大多数出版后就悄无声息, 对于西方读者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季进, 2014:33) 翻译如何助力中国文化真正有效的走向世界, 成为译界需要考虑的重要命题。

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于194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 是第一部对中国哲学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 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一扇窗口。而另一方面, 中国作家莫言的代表作《生死疲劳》, 是莫言在西方文学界获奖最多的作品。本文拟从跨文化阐释的角度对《简史》与《生死疲劳》的翻译进行对比, 分析其中共有的成功跨文化阐释的构成因素, 以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英译工作提供有效的借鉴和参考。

一、跨文化阐释理论

形式主义语言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罗曼·雅各布森认为, 翻译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得到理论的描述和界定: (1) 语内翻译, (2) 语际翻译, (3) 语符翻译或符际翻译 (Jakobson, 1992:144)。对于语内翻译, 即使是同一种语言, 将其古代的形式转换成现代的形式也几乎等于将其译成另一种语言。语际翻译通常指一种语言形式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形式。语符翻译即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 或曰跨文化的翻译, 注重从文化的整体视角来考察如何准确地将一种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加以再现, 尤其是忠实的再现一种文化的风姿和全貌。(王宁, 2014:6)

二、《中国哲学简史》与《生死疲劳》的语内翻译

一般认为, 语内翻译是指同一语言中由于某种目的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 也就是“改变说法”(rewording)。(张瑞华, 2015:110)《简史》与《生死疲劳》的语内翻译均由两部作品的原作者完成。

(一)《简史》从传统到现代的语内翻译

《简史》在语言层面和思想内容层面无不体现出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进行的“历史性”解释, 即把经典的历史文本转化为以译者所在时代的文化语境为标尺的现代文本。如关于“天”的翻译, 《孟子》记载, 梁惠王问孟子: “天下恶乎定?” 孟子回答说: “定于一。” 冯先生认为, 这里的“一”就是“统一”, 这里的“天下”, 意思是“世界”, 用“world”来翻译更准确。而不同于中国古汉语中其他的自然之天(nature), 上帝之天(heaven)或宇宙之天(universe)。(冯友兰: 1996:156, 166, 196)

(二)《生死疲劳》从传统到现代的语内翻译

莫言作品的特色是“将梦幻现实主义与历史的和当代的民间故事融为一体”(王宁, 2014:9)。莫言用现代叙事手法对传统文学素材进行阐释, 赋予了传统文学素材以新的意义。《生死疲劳》在语言与内容层面也均体现出作者现代化的创作风格。如: “我是谁的儿子? 我是母驴的儿子, 我看到站在那里浑身颤抖的母驴, 我的母亲? 一头母驴?” (莫言, 2006:15) 内容是中国传统佛教六道轮回的素材, 语言是现代化式的。莫言还对中国的土地改革进行了文学创作式的调侃。原文似乎暗示, 跟封建时期相

[投稿日期] 2017-06-16

[作者简介] 曾辉 (1981-), 女, 湖南邵阳人, 讲师, 研究方向: 跨文化交流与翻译。

比,中国20世纪50年代在新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没什么新意,都是均分土地,但比之更恶劣的是,现今不但要均分土地,还要毙掉土地所有者。(邵璐,2013:68)可以说,莫言从现代读者的视角对中国土地改革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了评比,使历史事件产生了新的意义。

冯友兰与莫言分别对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民间的文学进行了现代化的阐释,这种语内翻译的形式在西方读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架起一座跨越历史鸿沟的桥梁,缩短了西方读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

三、《中国哲学简史》与《生死疲劳》的语际翻译

两本著作的译者都试图在尽量忠实地保留与传达中国哲学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过程中,以读者的理解为主要目标,在语际翻译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语境和翻译目的的需要,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译介,以解释介绍为主;对文化信息含量过多,造成读者理解负担的内容,以删减或回避为主。

(一)《中国哲学简史》面对读者的语际翻译

《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先生的英文著作,该书的内容主题、处理方式和具体写作,都是冯先生亲自完成,而德克·布德博士的工作“主要是考虑西方读者的需要,就语言和易读性做一些编辑加工”。另外,该书的“许多引文都是布德博士所译《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译文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只做了微小的变动。”(冯友兰,2015:635,637)

例如,在《简史》第二章,冯先生译介中华民族的地理环境时,提到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来没有到海上冒险的经历。

在论语里,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冯先生的译文是:“If my way is not to prevail, I shall get upon a raft and float out to the sea. He who will go with me will be [Chung] Yu.”而为了让西方读者理解这段话的意思,紧接着解释“由”的含义。(冯友兰,2015:31)

而布德博士引文的翻译,主要参考对象是理雅各的五卷本巨译《中国经典》,但布德都会做一些修订,加入自己的独立思考。如,关于人性善,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

孙丑上》)。这段话中,理雅各将“端”译成 principle,而布德译成 beginning,理雅各将“仁”译成 benevolence,用的是一个现有的英文词,而布德则使用了一个新生造的词 human-heartedness。其中,不仅反映了布德侧重于忠实中国哲学思想与文化的翻译思想,且体现出其用简明英语单词解释与传递中国哲学思想的翻译策略。

(二)《生死疲劳》面对读者的语际翻译

葛汉文在对《生死疲劳》的翻译过程中,主要采取增、删和语境转化等翻译方法。如:“西门闹,你还闹吗?”(莫言,2006:3),其中,葛汉文采取先用汉语拼音音译,然后增添注解,说明这个名字在中文中所暗示的含义,使读者易于了解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而在中西两种语言所指的文化信息具有可比性时,葛汉文又灵活的采取语境转化的方法,用英语语言中所对应的语言表达替换汉语的语言表达。如:“我身受酷刑而绝不改悔,挣得了一个硬汉子的名声。”(莫言,2006:3)其中,葛汉文将“硬汉子”直接转化成英文的“the iron man”,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完整,而更易于被西方读者所接受。葛汉文的英译本与莫言的原文具有同等的价值,这一点连莫言本人也不予否认。

四、《中国哲学简史》与《生死疲劳》的符际翻译

《中国哲学史》与《生死疲劳》两本著作在符际翻译的角度来看,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源语文本的作者都具有中西对话的创作视野,源语文本都包含大量中西文化对话的内容,因此在文化和文学的交流上存在先天优势,存在跨文化阐释的可能性,即源语文化向目的语文化转换的可能性,也称为“可译性”。

(一)《中国哲学简史》的可译性

首先冯友兰先生的哲学研究师从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家Dewey和新实在论者Mantague,走的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道路,倡导汲取西方哲学以及西方其他学术观念,以中国传统哲学为质料,以西方逻辑分析法为形式,从而构成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阅读视角”、“诠释方法”(陈来,2002:84)因此,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一大特点是中西对话、中西互释、中西互补、中西融通。

如在简史第十五章,冯先生译介中国传统文化中“中”的概念时,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中道为贵”(the golden mean)进行类比。这种类

比使得译语读者在已有的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能更好的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提高跨文化阐释的有效性,促进源语文化的传播。又如在《简史》第十章,作者在译介中国早期道家对感情和理性的看法时,提到在道家看来,人对万事万物增加理解,就可以减少感情造成的痛苦。作者将其与西方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哲学观点进行了互释。使读者能将两种哲学思想融合起来,形成新的理解。

(二)《生死疲劳》的可译性

莫言的创作则受到现代主义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后现代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莫言从文学生涯的一开始就有着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他不仅为自己的故乡高密县的乡亲或中国的读者而写作,更是为全世界的读者而写作,由于他所探讨的是整个人类所共同面对并关注的问题,他的作品在创作之初就已经带有了某种程度的“可译性”。(王宁,2013:10)正如福克纳的作品专门描写美国南部拉法叶县的一个“邮票般”大小的小城镇上的故事,莫言也将自己的许多作品聚焦于他的故乡山东省高密县。(王宁,2013:10)

莫言的叙事风格对西方评论者和读者具有吸引力。在西方评论家看来,莫言小说体现了食人主义(cannibalism)。葛浩文认为莫言小说的主题充满了食人主义。“几千年来,西方文学中食人主义题材不尽其数”,无疑这种题材的小说能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邵璐,2011:53)莫言小说叙事题材和风格

的国际化,正是其小说具有可译性的原因。

五、结语

从跨文化阐释的角度来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与莫言的《生死疲劳》都存在由传统到现代的语内翻译,以面对读者为主进行解释评注的语际翻译,以中西文化的对话和融合为特色的符际翻译。这些跨文化阐释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西方读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隔阂,成为有效的文化与文学翻译模式。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真正走向世界具有极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王宁.翻译与跨文化阐释[J].中国翻译,2014(2):5,19-26;9,39-41;10,18-33.
- [2]张瑞华.简评《中国哲学简史》中的哲学翻译观[J].中原工学院学报,2015(5):110,1-17.
-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赵复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 [4]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 [5]邵璐.莫言小说英译研究[J].中国比较文学,2011(1):53,17-20.
- [6]陈来.中国哲学的近代化与民族化——从冯友兰的哲学观念说起[J].学术月刊,2002(1):84.

[责任编辑 王云江]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ranslations of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ZENG Hui

(Tan Kah Kee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Zhangzhou3611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age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how can translation help Chinese culture step into the global socie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There exit many common features of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translations of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The paper compares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two books and tries to explore and summarize these features so as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Key words: translation;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C-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